

第一輯



耕耘者

詩

杜志民著

山地風

227
069

耕耘者书丛·第一辑

山 地 风

杜志民 著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6.125插页 2 字数 127,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2600册

ISBN 7-5407-0474-8/I.356

定价:2.30元



杜志民 生于1944年的山东济南市。解放后，随父母返回祖籍河北省清河县。1968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1970年因机遇携笔从戎，参加人民解放军某野战部队。

入伍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评论等。1974年调北京部队战友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当年出版诗集《哨所风雪夜》。1976年调《解放军报》任文艺副刊编辑至今。其间，在全国报刊发表诗、散文、小说、评论多篇，并出版军旅诗集《阵地上的小花》等作品多次获奖。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近年来，除写诗外，大部分业余时间专用来进行小说的创作与研究，新发表的小说有《心系》、《戛兵》等。

战争诗的实验

——杜志民与他的前线纪实诗

(代 序)

周政保

什么是战争诗？我只能说：战争诗是诗的一种存在方式，即它首先是诗，然后才谈得上它的抒情方面的独特性：它是以战争、以与战争相关的精神存在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的，或者说，战争诗与非战争诗的差别，仅仅在于抒写对象的某些不同。实际上，出于诗的审美思维与诗的表情达意的特点，某些诗的表层抒写及其所呈显的具象，并无特别显著的战争色泽与战争气息，甚至根本没有直接涉足人类战争生活的土地，譬如抒写对象是险峻的山、咆哮的河、奔驰的马、盘旋的鹰、沉寂的雪野、无垠的戈壁、神秘的丛林、热烈而紧张的运动场上的某个角落或某项

正在进行的竞技,等等,但这样的诗所容括所体现的主观思情意蕴,完全可能与战争相关,或者与人类战争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情感方式产生相应的契合。那么,它们能否可以被称为战争诗呢?我想,在特别的创造主旨的笼罩下也是可以的:其原因往往不仅仅在于诗者的精神指向与主观意蕴企图,而且在于阅读,在于读者欣赏的心态与视野的可能性——在现代接受美学理论那里,读者的具体化是第一性的,未定性的本文是第二性的:真正的诗其实只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之中,而这个主观世界又不仅仅是本文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期待视野”或“流动视点”处于能动的主导地位时对具体作品的再创造——关于战争诗及其艺术质量的判断,我以为也是如此。

战争诗具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因而对于诗者来说,创造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但创造离不开实验,实验往往是新的创造的开始;实验之于当代军旅诗领域的模式化倾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不会因幼稚或肤浅而被抹煞:实验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标志。

杜志民已是一位中年军旅诗人,几年前出版过一本诗集《阵地上的小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这本诗集的抒写对象比较独特,大都以现代化的军事

演习作为思情的契机，从而写出了当代军人灵魂的呼喊，且不乏热气腾腾的现代化战争气息——当然是一种“假设”的“现代化战争气息”，因为抒写对象是“演习”。我在一篇谈论当代军旅诗创作的文章中这样评价过《阵地上的小花》：“杜志民写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仿佛从现代化军事演习的直接感受中彻悟到了某种基本的原动力与感召力，并寻找到了——一条可以从整体或局部上传达这种崇高精神的通衢，而这条通衢是指向充满了当代质感的、预言着未来战争的思想高度的——他不仅自觉地意识到了今天的军旅生活与昨天的军旅生活的巨大的区别，而且寻找到了表达这种意识的诗情化的途径。”然而，现在摆到我面前的这些“前线纪实诗”（此集的上辑部分），则显示了另一种艺术风貌：新的抒写情调、新的审美视角、新的判断高度、新的诗化抽象与诗化综合体现、其中还包孕了诗人的新的诗观念及关于当代军旅诗（或战争诗）的新理解。

如果说，《阵地上的小花》热烈而明朗，充满了理性的机智与激情，那这些“前线纪实诗”就显得沉郁而隐含了：诗人的情智大都被积聚在真实的生活面貌的抒写之中，然而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则在于：《阵地上的小花》写的是“演习”，其“战争气息”的产生背景毕竟是一种“假设”，但“前线纪实诗”则是从真实的战地生活中滋生出来的情感与思考——1986年的

夏季，诗人曾作为战地记者而奔波于老山前线的山岳丛林，这正如他的诗作所记载的：“七月、八月/亚热带行将变成热带时/我穿上了一身作战服/没有领章和帽徽/我反而更象个军人/在尖石路上跑/在‘三转弯’里跑/在死亡谷里跑/被炮弹追过三次/被毒蛇撵过两次/我听惯了高机子弹击穿/空谷的声音/地雷炸断人腿骨的声音”，诚然，“不是胆子大/一身冷汗和一个下意识躲避动作/一个潜意识里萌生的可怜期冀/…的卑劣”。即使是诗人对于自己所作的抒写，也显现了一种坦诚的品格，一种摒弃了虚张声势及故作豪壮之后所产生的真挚与真实，一种以真挚与真实的思情建立起来的战场士兵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被沉积在朴素的抒写之中：既是战争的又是人生的，既是死亡又是诞生，既是实在的又是思考的，既是前线的山岳丛林又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景况的一部分——这就是杜志民的战争诗的实验。

无疑，这种实验是以诗人的战地生活体验为前提的。战争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类文化行为，因而关于战争的体验及思情的发现，在某些诗者的想象中往往显得十分苍白与肤浅：但我并不是说抒写战争诗一定要具备战场生活的阅历，而是说，亲身的体验之于诗的创作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苏联小说家普罗斯库林（《命运》的作者）特别注重感觉：“体验死的

感觉,体验战争的气氛和环境”,尤其是那种对于战争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对它反人性本质的感觉”,但这些感觉是怎样产生的呢?据普罗斯库林自述,他是在少年时代的充满了灾难的大撤退中产生的。战争之于人类生活是灾难与痛苦,但战争的切身经验(那怕是战地记者那样的阅历)对于战争文学(或战争诗)来说,却是一种创造的财富,一种可能造就新的发现的幸运……不少到前线遛过的诗人也曾写过许许多多的战争诗,但其中究竟存在多少战争的血色与气息?又存在多少战争的真实与战争的思索?不过在这里,我并不要全部地肯定杜志民的“前线纪实诗”,因为这些作品也仅仅是“实验”。

这些“前线纪实诗”是战争诗的一种独特形态,但它又区别于我们常常说到的纪实文学(如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等)。所谓“纪实诗”,只是它富有某种纪实性特点:如抒写对象的纪实性,或精神内容的纪实性,因为诗不可能象报告文学那样实现全方位的描写真实。但这样的诗与当前的那些写得过分圆熟、也过分艺术而终于有点儿虚假做作的战争诗相比,已经十分令人满意了。因为作品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残酷而充满人性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诗人的军旅诗创造的更新与开拓。

纪实诗的标志就是真实，而这种诗的真实性毫不犹豫地给阅读带来了亲切感与信任感；不过，就诗创造而言，真实性不仅意味着表层抒写的充分生活化，或者是向着战场生活画面的靠拢或接近，而且（也是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诗的感觉、诗的感受、诗的抽象或概括的真切可靠：脱离狭隘而苍白的臆想或幻想，而使真正的诗想象既不脱离土地又不拘泥于土地。

杜志民的这些“前线纪实诗”与一切可以被称为诗的诗一样，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感慨与思考，甚至是嘲弄或隐隐的现实抨击，然而得承认，无论是理性还是激情，它们都来自战场现实，来自那种只可能在战场现实中才可获得的感觉或感受——如他的《主峰》、《腥红的太阳》、《兰草》等。他在《腥红的太阳》中写道：“在枪声炮声地雷/和开山炸药的混声里/太阳象从炮管里射出的/弹丸/泛着腥红/泛着焦糊味”；而《兰草》经由普通事物的神圣化这一现象，相当出色地揭示了一种只可能在战场才会产生的心理现实；《那一条静静的石头小径》既写了战场现实又写了人的心理现实；“痛苦也属于小径/炮火和硝烟/使它痉挛成颤动的琴弦/唱流血唱牺牲/唱不能相见的团圆的月/战争 是可悲的琴师”，接着又写道：“一阵轰轰烈烈之后/它变成晨光般宁静/虽然只是暂短的休止/却格外美丽/——士兵们这样说”。

感觉或感受的真实，是纪实诗的艺术真实性的主体来源：虽然感觉或感受之于诗人的个体及主观都是“真实”的，但之于世界的存在、之于战争的本质，却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杜志民的“前线纪实诗”所显示的感觉或感受的真实，却是一种真正的战场生活的真实：它以诗的方式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理性的、充满了炮火与硝烟、流血与死亡的真实世界。我愿意再重复一遍——那是一个立体的世界，一个寂静而又紧张的人性世界，一个既是诗的又是现实的生命世界，一个是战争但又不仅仅是战争的艺术世界。尽管诗人抒写或构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显得有点儿随意与散漫，但其中仍然闪烁着一个诗创造者应该具备的——那种从洞观与沉思中凸现的智慧。

智慧被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主要被体现在诗抒写历程中所包孕所沉积的那种关于战争的理解与阐释——诚然，这种理解与阐释不可能是论述或析说，而是一种诗思诗情诗意诗味的复合形态，一种被称为“纪实诗”的、并由杜志民署名的诗方式。

实际上，凡是写战争诗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以自己的诗方式向读者传达着对于战争的理解与阐释：或深或浅，或宽或窄，或局部或整体，或持民族立场或含人类意识……

自觉与清醒的洞察姿态,来审视战争与思考战争、来究诘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会战火不息,会互相残杀而血流成河的问题,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种诗思诗情的深化趋势,也说明着中国式的战争文学正逐步走向成熟。不过,“战争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或历史哲学问题或文化哲学问题),它不是人人可能接近或探入其堂奥的问题,更不是诗者或诗创造可能回答的问题:因而诗的理解与阐释只能是一种战场生活的具体感受或具体感觉——关于战争的理解与阐释,往往呈显为读者的阅读体验及理性的再创造。这种诗创造与诗阅读的情形决定了:战争诗也不可能把关于战争思考的精确而全面的结论告诉读者——这不仅是诗的特性所致,也是诗者的情智可能所致。我们读杜志民的“前线纪实诗”所获得的,就是这样一种印象,但这些诗却极为真实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战争的生动世界,而且是一个经历了诗人思考的世界:已经思考或顿悟了,也就实现了诗创造意义上的理解与阐释——对诗人,我们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尽管人们常说,诗人应该是思想家或哲学家,但诗人终久是诗人,就象艾略特几乎可以获得哲学博士的头衔了,但我们只能把他视为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与探索存在世界的诗人。

在杜志民的这些“前线纪实诗”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一个记者，一个诗人和一个战场》、《亡曲三部》、《完整的世界》、《残缺》、《欲望》、《山朦胧》等。

关于《一个记者，一个诗人和一个战场》，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评论过，此处不赘。

《亡曲三部》抒写了战地军人的品格与实际命运，抒写了“地球人”与“诗人”的对话，但无论是军人之死或诗人之死，诗的立意都指向战争这一人类生存内容的沉思与探究——《赵怡忠之死》作为这组诗的第一部分，其实是通过军人的献身历程而展现了战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写得具体实在，但又寓意深远；《袁琪之死》无疑写得大胆而宏阔，思情独特。而作为这组诗的最后部分，《诗人之死》则从一种辽远的审视高度出发，提醒战争着的人类应该具备“宇宙意识”，应该具备真正呼吁和平的诚意……作品最后借“地球人”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啊诗人已死/死在战争的雄辩里”。所谓“地球人”与“诗人”的关系，大致上是一种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或一种总体与局部的关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与国家，几乎所有的智能健全的人，都对战争这一人类文化的最危险的结果表示担忧与谴责，但战火依然在人类生活的琴弦跳动与奏鸣——“诗人”的确死在“战争的雄辩”里了，或者说，死在战争的悲壮感及关于战争的讴歌或诅咒之中了……

诗人的这种审视战场生活的宽广而富有高度的洞观眼光，使纪实的战争诗产生了超越自身抒写对象的艺术光彩。关于这一点，诗人是自觉意识到了的——《诗人之死》中的“地球人”这样说过：“诗人的智慧是感觉/也是一种愚钝：/把战场只看作了战场/把军人只看作了军人/其实时空任何角斗/皆是一场酣战/是悲剧导演人生/是人生追寻悲剧/人的从生走向死亡/全不在乎有无战争/更不在乎形式上的剧烈与残酷”。实际上，这是诗人的关于战争诗观念的一点儿自我表白：他写战地生活是为了写战争，而写战争是为了写人类生活的景况：写战争而超越战争，抒写战争只是一种诗思诗情诗意诗味的表现契机。

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诗理解的牵引下，诗人写下了《完整的世界》：“战场成动态成不陨落的/完整星际/世人会读它如世界/如一部苍茫史诗”。在这组不长也不短的纪实诗中，诗人借着战场的种种见闻与遐想，以及种种司空见惯的但军人诗人们又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了的生活现象，向读者传达了一系列的关于战场或战争的思考——这种思考集结到一点，那就是战场即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是“一种生活”或“一种存在”，是现实但亦要成为历史；战场很美丽，紫雾，银瀑，晚霞，微风；也有讪笑，也有阔骂，也有满腹牢骚的倾泻，也有机智、勇猛、疯狂……“世界

总是很完整/完整若圆/如构思攸好的传统小说/即便有偶然的残缺/也是为圆满而铺垫”，于是我们在这个“完整的世界”里，感悟到了诸如“国界”、“敌人”、“牺牲”之类的概念的意义，领略到了军人作为人的那块情感与精神的土地上的真实，那种伟大与平凡、创造与虚荣的模糊界限，那种托举鸽子而枪在肩上的姿态与心态，那种异彩纷呈，那种杂沓无度……

这就不仅实现了纪实诗的真实性，而且也接近了写战争而超越战争、写战场而不仅仅是为了战场的艺术宗旨：这就意味着真正接近了“诗”。

接近生活的原生面貌或再现战场生活的真实感，应该说并不难，但要使笔下的抒写、而且纪实性的抒写接近“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种接近不仅要寻找到自己的艺术方式（或途径），而且要以独到的战场生活发现与具有思情质量的感觉作为前提与基础：你的战场既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可信的战场，又是一个诗人目光中的战场——这就需要你拥有新鲜的发现及与众不同的彻悟。

杜志民在这些“前线纪实诗”中所寻求的，也就是这种发现与彻悟：是现实的也是诗的。他写主峰、写兰草、写战场上的腥红的太阳、写生、写死、写烈士陵园、写伤兵、写暗夜的潜伏……都给人以新颖独到的印象。如那首《欲望》，应该认为是当前战争诗中

的一首力作：真切而富有寓意性——那是一种人性内容的揭示，一种地道的战场心绪的呈显，但严格地说，这种产生于战场的士兵欲望，也是一种人的欲望的体现，这样也就从“欲望”的角度向着战争的本质迈出了靠拢的步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新颖的发现与独到的彻悟，也就构成了一种诗的思想寓意的超越：超越并不神秘，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对于诗者的自我质量及艺术素养，却是严峻的考验。

在战争诗里，生与死几乎造就了诗的抒写的永恒旋律，但这并不是窠臼，而是一种激发创造的母题，因为战争总是与生死问题连结在一起的；战争不仅制造失败与胜利，也制造流血的苦痛、死亡的深渊、生还的欣喜——生与死可以把战争诗的创作推向“表现”的极至，推向那种不能不思考诸如生命的意义、人性的秘密、人类的命运与前途之类命题的境地，同时，也可以把战争的理解、特别是它的反人性本质、以及那种作为人类文化的最危险成果的宏阔而深厚的内涵的揭示，引入一个不仅仅由爱国主义或民族精神或英雄气概来阐释的无限领域。实际上可以说，战争是人类生存景况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或者是未来的——最完整最深刻的注解：人类究竟是什么？那就去探究战争。

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人性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

在战场上拾取与发现。战争，是对人的生命力量与文化背景之上的人性内容的赤裸裸的耕耘与收获——我想，杜志民的“前线纪实诗”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不难想象，在那些难以用三言两语来表达的战争生活中，还不知有多少可以用诗的方式来体现的思情寓意呢！战争永远是诗人的抒写对象，就象某些杰出的小说家始终把战争作为描写与表现的母题那样：那是一个抒写不完的文学领域。

战争诗是军旅诗的最重要的构成。我想，即使是在未来的诗创造时期，其格局也将是如此。

我在前面说过，我并不想全部地肯定杜志民的“前线纪实诗”的创作：如果去作全部肯定，那诗人与我都会显得不真实。在我看来，诗人能以记者的身份而在前线生活了几个月，那必定积聚了一笔精神的财富——这财富就是“体验”与“感受”（这是两个被用滥了的因而也不再起眼的常同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体验”与“感受”，还将在诗人的记忆中重新被唤醒、被体验、被感受，或者说，它们还将获得新的发现与升华，还将在新的生活参照之下而再放光芒。就我读到的这些“前线纪实诗”而言，总觉得还有点儿不尽人意，还有点儿与表现的可能性不相称，就是说，诗人还可以写得更多更好一些——譬如说，拥有一个更全面更纵深的整体构想，各种方式与各

种角度，各种感觉与各种理解，各种判断与各种阐释，交相辉映而自成一个“前线纪实诗”的“完整的世界”，而现在，或多或少地呈示了些许的全局构想方面的零乱与不均称——也许是发表时造成的缺憾，但愿作为诗集出版的时候，人们可以见到另一副模样。

1988年6月
远离战争的天山下